



晋西北租佃制度与借贷关系之研究

战争·革命与 乡村社会

张 玮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晋西北租佃制度与借贷关系之研究

战争·革命与 乡村社会

张 玮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革命与乡村社会：晋西北租佃制度与借贷关系之研究：
1937—1945/张玮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
ISBN 978-7-5004-6774-8

I. 战… II. 张… III. ①租佃关系—研究—山西省—1937—
1945②借贷—经济关系—研究—山西省—1937—1945 IV.
F329.25 F83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0460 号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弓禾碧工作室
技术设计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5

插 页 2

字 数 273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向山西师范大学五十华诞献礼

序

区域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就以张玮博士的研究而言，不久前我就读到她和岳谦厚教授合著的《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写的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农村社会，现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战争·革命与乡村社会：晋西北租佃制度与借贷关系之研究（1937—1945）》又要付梓刊行了。这是她几年来在晋西北乃至山西省各地档案馆劳苦奔波以及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不懈追求知识的成果，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亦展示了她的研究风采。

社会是一有机体，包含着诸多内容，而各部分内容又是相互关联的，有人从地理环境中去研究，有人从政党与社会变迁中去研究，有人从人口方面去研究，有人从乡村结构变化中去研究，有人从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上去研究，等等。历史学者总是将社会发展和进步过程中具有重要性的问题拿来探讨，张玮博士选择了那个时代的租佃和高利贷问题，这是旧社会非常普遍的现象，而研究地区则很有自己的特性。

农业为中国立国之本，农村问题历来是关系中国社会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国家的兴衰存续，社会的发展变动均与农村休戚相

关，从历代封建王朝到国民党政府再到共产党执政，无不致力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进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就是掌握了当时农村问题解决的主动权和发言权，并通过革命的方式改变了原有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使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多年社会主义实践，既取得了巨大成绩，又发生了诸多失误。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变化，农村面目亦日新月异，向小康社会迈进。在学术界，近代乡村史遂成为备受人们重视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已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

华北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向来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不过，在已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中，山西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却相对较为滞后，多数研究将视线集中于华北腹地农村且将重心放在冀鲁或冀鲁豫地区，而边缘地区农村或诸如晋西北地区之类的偏僻农村则似乎被从中“省略”或“剪裁”了。这可能是地理环境和阎锡山实行“锁省政策”与外界隔离所致。但从整个华北区域史来讲，中心地区或沿海省份并不能完全反映华北农村的实际状况。张玮博士选择晋西北农村社会经济来研究，既可补充先前有关华北农村经济研究的不足，又可加强对华北“小区”类型的研究，亦十分有助于理解华北腹地农村与边缘地区农村在多大程度上相似又在多大程度上不同，或晋西北农村与华北其他地区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怎样等诸多问题，进而准确地把握华北农村的全貌。

八年的全面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日军入侵和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这两大因素使晋西北农村发生了变动，而此前阎锡山实行的“土地村公有”、“物价证券”等政策弊端百生，行不通，无形停顿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为应对日军

入侵，整合了乡村原有的资源配置，改变了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引起了农村社会经济与生产关系的巨大演变，其中租佃关系、借贷关系、雇佣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土地制度等变化最为剧烈。张玮博士的研究成果刻画了“常态”下变化缓慢的农村社会的主要经济关系——租佃制度和借贷关系，使人们对那时底层阶级的家庭和社会生活有了真实的了解，这种研究成果是弥足珍贵的。

历史研究者总是多方发掘资料以充实自己的论述，张玮博士从各地图书馆、山西省各级档案馆搜索资料，特别是收集和阅读了长期以来为中外学者高度关注的张闻天晋陕调查之兴县 14 个村的原始调查资料，经过认真的梳理和思考，提出了自己对晋西北租佃体系与借贷关系演变的历史性解说。

张玮博士在整个研究中，始终以“传统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减租减息政策的表述与实践作为中心线索，并通过对该政策两个层面的实证性分析，充分再现了减租减息政策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减租减息过程的艰难曲折性，阐明了减租减息政策在表达与实践层面所存在的颇多距离，亦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地主和佃户以及中国共产党与高利贷者和负债者三者在此过程中关系“互动”的基本图景，或以生动而翔实的资料刻画了地主和高利贷者对共产党政策的“反制”以及共产党在此情势下的因应之策。

通过对各种资料的缜密考证和研究，张玮博士提出了一系列十分中肯的判断或结论。例如，在上篇研究中，作者认为战争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减租减息等政策的实施使农村土地开始发生“均化”现象，这种土地转移在表层上似乎是通过自由买卖实现的，而其实却带有外加的强制因素，亦即张闻天所称之为的“迫”（对地主之“迫”）。农村社会阶层剧烈分化，出现

“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农化”走势。在地权变动之时，与之相应的租佃关系也经历着重大变化，地主和佃农围绕减租与交租及其相关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较量，某些已经逐渐退场的租佃形式以及原本存在的宗族血缘认同再次强劲反弹，甚或经过多次“改头换面”而以新的形式出现。下篇则认为该地区私人借贷虽有友情借贷和高利贷之分，但大都属于后者。借贷性质多为非生产性的“糊口借贷”，反映了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对债务的依赖。应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减息或限制到取缔乡村高利贷的政策与实践，暂时减缓或解决了债户的高利贷重负，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借债问题，以致甚而出现了农民重新“呼唤”高利贷的现象。高利贷在乡村社会是与传统小农生产等社会经济组织相适应的一种经济制度，具有存在的某种合理性。上述认识无疑十分有助于我们对革命中的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关系进行精确解读。

历史学者要使自己的著述站得住脚或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最重要的是判断客观公正。张玮博士以适应现代学术发展的新话语形态和“价值中立”或“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详细讲述了晋西北农村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经历过的那些“故事”。或者说，作者始终尽最大可能地避免任何价值预设以及由此引起的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的结果，而以理性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做到了言必有据、事皆可征，在翔实的史料和充分实证的基础上将革命中的晋西北农村社会发生了什么及其如何发生的“实相”描述出来，并以此微观的考察为诸多宏观的研究提供了细密的实证依据。

乡村史研究大有可为，尤其是近代中国边缘地区的农村社会研究则有更大的拓展空间。据了解，张玮博士已申请到了200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吕梁山区

农村社会的考察》课题，这对涉入学术殿堂不久的青年学者而言乃是一种令人兴奋的鼓励，相信她会沿着这条道路一直前进。

我祝愿张玮博士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生产出更多更优秀的历史学著作！

魏宏运

2007年9月于天津南开园饒斋

目 录

绪论	(1)
一 研究缘起和研究架构	(1)
1. 学术回顾与研究选题	(1)
2. 运用的史料及其相关问题讨论	(8)
3. 研究内容与行文结构	(24)
4. 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27)
5.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30)
附:晋西北度量衡单位	(32)
二 晋西北之社会生态背景	(33)
1. 地理与社会经济环境	(33)
2. 日本入侵与共产党革命之发生	(46)
附:中共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行政谱系	(65)
上篇 晋西北农村地权分配与租佃体系	(68)
一 地权分配及其变动	(70)
1. 私有地权	(71)
2. 集体地权	(82)

3. 租佃之多寡	(87)
4. 地权变动	(96)
二 租佃型式及其变化	(115)
1. 租佃方法与类型	(116)
2. 佃主与承佃人之构成	(122)
3. 租佃手续	(125)
4. 租佃期限	(129)
5. 租制与地租形态	(133)
6. 交租时间与方法	(149)
7. 租佃型式之变化	(154)
三 租率及其变动	(160)
1. 租额	(160)
2. 租率	(165)
3. 战争与革命场景下之租率变化	(172)
4. 租率变动景观下中国共产党减租的另面视像	(179)
四 减租与交租	(184)
1. 减租	(184)
2. 交租	(206)
3. 租佃纠纷与解决	(212)
4. 租佃过程中的宗族血缘认同	(222)
五 总结	(231)
下篇 晋西北农村借贷关系及其变动	(235)
一 农村借贷之型式	(237)
1. 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	(237)
2. 借贷类型	(242)
3. 借贷形态与借贷期限	(264)

二 农民借贷之基本情形	(266)
1. 负债率	(266)
2. 借贷原因与用途	(270)
3. 债务偿还	(273)
4. 借贷利率	(277)
三 战争与革命背景下之借贷关系	(286)
1. 借贷关系发生变动的历史背景	(286)
2. 中国共产党减息清债之绩效	(290)
3. 中国共产党减息清债的困境与因应	(295)
四 总结	(319)
重要史料与参考文献	(325)
后 记	(349)

绪 论

一 研究缘起和研究架构

1. 学术回顾与研究选题

中国自古就以农业立国，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国计民生均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农业人口占总数的绝大部分，“在整个国家中，没有哪个人不是农民，因为不仅在农庄，而且在任何其他你未曾预料的地方，你都会看到他们的身影”^①。因此，农村问题历来都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社会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国家的兴衰存亡，社会的发展变动，与农村休戚相关。正如 1931 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成立宗旨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乡村安定，乃可以安辑流亡；只有乡村产业兴起，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力；只有农产增加，可以增进国富；只有乡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基础；只有乡村一般的文化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

^① [英] 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译本），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90、289 页。

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都是如此。”^① 从历代封建王朝到国民党政府，再到共产党政府，没有哪一代政府不曾致力于农村问题之有效解决，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就是掌握了当时农村问题解决的主动权。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尽管通过革命的方式改变了旧有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使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农村问题却未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反而在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又出现强势反弹，并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最大瓶颈。此乃近 20 余年来历史学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等同时聚焦农村社会的主因，从而将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推向新阶段新高潮。

回首检视中国乡村史的研究，其起始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挽救“乡村危机”的呼声之中。当时，乡村文化建设、乡村社会结构、乡村经济等诸多内容均纷纷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但这些研究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走向深入和持久。1949 年后的 30 多年中，在近现代中国研究领域，有关农村研究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和土地问题等若干方面，而涉及乡村问题者则难出土地占有关系和农民生活贫困化的窠臼。^②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农村日益成为国人瞩目的对象。在学术界，近代乡村史亦因之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不仅引起了历史学者的高度重视，亦引发了经济学者、社会学者、政治学者乃至伦理学者的浓厚兴趣。近代农村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形成热潮，大量成果相继问世，内容几乎涉及乡村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为乡村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

① 朱宥潜：《今后乡村教育之动向与动原》，（南京）《教育与中国》第 2 期，1933 年 7 月 1 日。

② 王先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和展望》，《近代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

基础。就区域乡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观察,农村土地关系和各种经济关系、农业生产力、农业经营规模、家庭手工业或农村副业、农产品商品化和农村市场以及农民经济生活等问题均有涉及,而且有些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就研究的地域来说,几乎形成了遍地开花的格局,从华北到华中再到华南,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从沿海到内地再到边疆,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再到落后地区,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再到珠江流域,从陆地到江河湖泊再到海洋,从平原到山区再到高原和草原或大漠,等等,区域乡村史研究蔚然成风,大有独领风骚之势。

在近代中国,华北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有关华北农村社会的研究,向来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就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而言,^①近些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从海外引进并翻译出版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有[美]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美]马若孟(Ramon H. Myers)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从翰香的《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苑书义等人的《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日]内山雅生的《20世纪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郑起东的《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李金铮的《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

^① 经济地理学家孙敬之认为华北区包括山西、河北、河南、山东4省(见孙敬之主编《华北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华北地区地处黄河中下游,大致在秦岭黄河以北、长城以南,包括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以及北京、天津和周边地区。有关“华北”的概念,笔者采借了目前学界通用的表述。

华北乡村借贷关系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李正华的《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 20 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8 年版)等著作。

综观上述研究成果,除从著之外,其共同之点均是以华北作为研究区域,但在研究过程中多以冀鲁两省或冀鲁豫 3 省为主,只是苑著与之不同,而将研究重点转向了冀晋内蒙古 3 省区,弥补了以往对华北“小区”类型研究的不足。三位国外学者的代表作,在理论与方法上均有较大建树。例如,马氏之作通过对华北农业经济的考察与农村社会的深入研究,开创了近代中国农村区域研究和综合研究的模式;黄氏著作以“社会变迁”为轴线,研究了小农经济的内卷化和社会分化,并探讨了自然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内山氏的研究则以“农村共同体”为主线,并将中国革命与“共同体”联系起来考察了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过程。三项研究成果在史料运用上的共同特点就是对“满铁”调查资料的充分挖掘和利用,这可能既是它们的优点,亦可能正是其局限性。正如黄著在研究背景中所指出的那样:“满铁”调查的村庄是明确的,主要分布在冀—鲁西北铁路沿线和城市近郊地区,“不能视为在广大的河北及山东西北部地区的代表性标本”,更不能“用作华北所有自然村的标本”^①。在国内的代表性研究著作中,从著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重点考察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前冀鲁豫乡村社会结构、市镇、农业和手工业,以及田赋和徭役的演变和发展;苑著着重探讨了晚清至民初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变革的艰难性;郑著在研究视角和研究区位上与从著相同,对转型时期的冀鲁豫农村社会结构、国家对农村的征

^① [美]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44—45 页。

派、影响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要素、农户收支与农民物质生活进行了分析；徐著以区域史研究的方法，对明清时期的华北农村经济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英国乡村进行了比较。而李金铮和李正华的著作则分别以乡村借贷关系与乡村集市为切入点，详细剖析了民国时期华北农村借贷的实际状态和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艰难过程，以及近代华北乡村集市的类型、分布、规模、运作方式、特点和要素等，这两项成果与前面各项成果最大的不同在于选择了民国时期乡村社会某一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此外，类似的研究成果还有罗仑等人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齐鲁书社 1984 年版）、许檀的《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等。

在这些成果中，笔者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山西农村社会经济似乎没有引起这些研究者的重视，除苑著和另两部专门的山东农村经济研究著作外，其余冠之于华北农村研究的著作几乎均将重心放在了冀鲁或冀鲁豫地区，从著则非常专注地只研究冀鲁豫，而且研究的时段以明清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为多。这些取名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的著作，或许是受到了资料检索或就近取材的限制，以致它们研究的地域范围基本上是华北腹地农村，那些边缘地区的农村则被从中“省略”或“剪裁”了。这样，其研究结果就很可能会发生被误读的情形，即将华北腹地的某几个地方或某一二省份的某些农村的经历等同于整个华北农村的经历。

笔者近年来曾多次到晋西北农村进行考察，感受到这里的诸多情景与前面那些称之为华北农村研究的著作所描述的“华北农村相”不同，由此萌发了以晋西北农村社会作为研究选题的想法。其后，即对有关近代山西农村社会研究的专门著作进行了全面的检索，很快发现这方面的成果极少，仅有行龙主编的《近代